

庆 祝
王鐘翰教授八十五華誕
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
学术论文合集

主编 柏 桢

黄 山 书 社

庆 祝
王鐘翰教授八十五
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
学术论文合集

主编 柏 桦

黄 山 书 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祝王鐘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王鐘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柏桦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1999.6

ISBN 7—80630—408—8

I . 王…

II . 王…

III . 中国—古代史—明清时代—研究—文集

IV . K248.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860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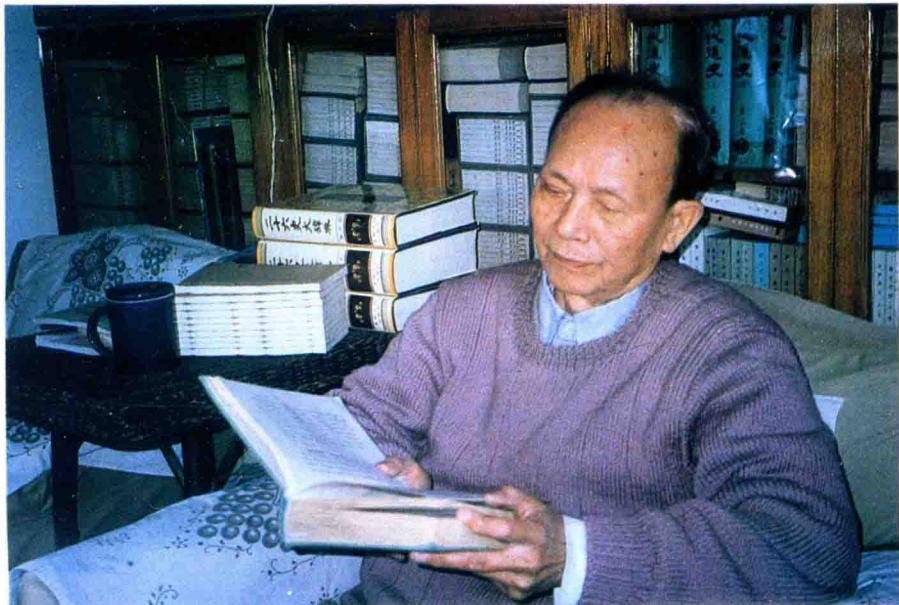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0 插页: 4 折页: 1 字数: 1076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 册

定价: 180.00 元



王 鐘 翰 先 生

王鐘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史、满族史与民族史专家，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等职。

王先生1913年生于湖南东安县，汉族。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获文学士；继入研究历史学部，1940年获文硕士，并留校任本系助教。1943年任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1946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两年，于1948年回国，任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兼历史系副教授。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授，后转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

王先生在清代政治制度史、满族社会经济史、东北民族起源、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及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作出了较大贡献。先生撰写的一些专题论文被译为多种外文，并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讲学交流，赢得海内外学者的好评，被誉为当代清史、满族史研究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收入国内外十多种《当代名人录》中。

王先生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三部论集，参加《清史稿》点校并独立校注460余万字的《清史列传》和校订《清鉴易知录》，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参加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及其《东北卷释文汇编》，任《满族简史》通纂及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中国民族史》主编等。

韦庆远先生

韦庆远先生，1928年生，广东省顺德市人。建国前在北京大学先修科，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1949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历史档案系、档案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年退休后，任中央民族大学满族史和清史博士点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韦先生自1981年起，先后应聘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访问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所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多次应邀到欧洲、日本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短期讲学。

韦庆远先生在明清史及档案学领域耕耘近5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著作有：《中国档案史稿》（《档案工作》杂志1957年），《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史料》（主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清代奴婢制度》（与鲁素、吴奇衍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清代的矿业史料》（主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档房论史文编》（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主编，按朝代顺序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清代的旗地》（主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明清史辨析》（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清代全史》第5卷（与叶显恩共同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王德宝共同主编，按行政、司法、监察、财政……等专题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清末宪政史》（与高放、刘文源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明清史新析》（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隆庆皇帝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序

白寿彝

人入古稀，每一年都是值得珍视的，逢五遇十之际，就更是如此。以征集论文集来庆贺德高望重的学者寿辰，可以说是学术界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事的同仁友好、时贤后进，也莫不视此为盛事，中外各国皆然。而以一部论文合集来对两位学者表示祝贺，则尤属罕见。

王钟翰教授是我多年的老友。在30年代初我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后两、三年，王君始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即有先后同窗之谊，弹指之间，已经60余年。当年他服膺天下兴亡的古训，耻史与国之偕亡，愤然立志专攻清史，志向之坚，用力之勤，为师友辈所赞赏。1957年秋他出版的第一部专集《清史杂考》，堪称其时清史研究的代表作。回忆70年代初，同被调往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工作，复有同事七、八年之雅。嗣后他又涉足民族史，不自满假，笔耕不辍，时有所获，独张一帜。

韦庆远教授从事档案研究多年，夙有志于明清史，以其坚韧毅力浸淫于档案资料数十年，厚积而薄发。80年代出版论著《档房论史文编》，字字有来历，决不轻下断语，治档与治史，融为一体，其博识睿见，俨然有名家风范。近年又有《明清史辨析》，令学者刮目相看。随之一发不可止，新著层出，如《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传》等，皆为学者传诵，且整理大量档案文献，如《清代的旗地》全三册、《清代的矿业史料》等，嘉惠学人。韦君驰骋于明清五、六百年间，创获极丰。

王、韦二君订交，早在50年代。韦君以英俊之年，常诣邓文如（之诚）师请教，因与邓师及门弟子王君相识。二君既同受邓师教诲，治学趣旨途径亦大体仿佛，论事评人，又多相投契。文革中王、韦二君往来第一历史档案馆核对清代档案稿本达数年之久，沉溺于明清档案中。相似的地位和处境，又使二君成患难交。时过境迁，如今已是改革开放，二君仍为明清史学的繁荣奉献余热。二君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多年，门人弟子受其沾溉甚深，各有建树，思有以报两位教授，莫过于弘扬师道，激励学术，故联合倡议为庆祝两位教授华诞出版一部论文合集。这一义举得到海内外知名学者如美国何炳棣、孔飞力、白彬菊、刘元珠，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中见立夫，英国科大卫，加拿大陈捷先，意大利斯达理，俄罗斯庞晓梅，韩国金鍾博等教授的鼎力支持，或惠赐鸿文，或慷慨解囊，不及一年诸事毕集。

寿彝承编辑者雅命为序，谊不容辞。试观集中论题异彩纷呈，蔚为大观，而寿彝不及一遍阅，未敢妄加评议，兹唯略伸一己之私见如下：

治史者历来有通儒与专家之别，不独通史与断代史如此，各朝之间，一朝之内，亦有通识与专门之学。我认为，二者形似对立，实则统一，前人所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也。明清两朝，典章制度沿革损益，联系既密，差异复著。从历史文化演变来看，不知明，则无以辨源流；不知清，则无以知变异。明清史料浩繁，非以往各朝所能比，不作各种专门研究，实不易深入，然惟兼有淹博通识，方可臻于上乘境界。方家以为然否？

史学发展至今日，多方位向外渗透融合，各种交叉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乃在意料之中，但这

并非意味史学本身已到末路。与一些新兴学科相比,史学似更有基础科学的特征。政治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思想史、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等等,本是历史学科中应有之义。基础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其中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往往需要长时期的冷静思考,决非一时所能奏效,然而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对人类社会过去与未来的把握,甚至新兴学科的发展程度,也都要取决于基础科学的进展。史学存在的价值,即在于此。如果一种学科已不能从自身的发展中提出新问题,其生命力也即将结束。我们有幸地看到,史学,特别是明清史研究,许多重大课题尚未解决,同时又不断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其具有无限远景的象征,也许要待 21 世纪,才会显示出其真正的辉煌。那么,在世纪之交出版这部祝贺二位教授寿辰的论文合集,就会更有意义了。

1998 年 7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明代进士与东南文人.....	(美)何炳棣(1)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邹逸麟(7)
明清时期湖北江陵地区的经济	吴量恺(17)
明清政府与天津城市经济变迁	徐永志(27)
明朝历次玉牒纂修活动的起止时间及其所记内容的时间范围	南炳文(32)
明代社会阶级结构的主要特征	商 传(44)
论戴良与丁鹤年	
——兼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郑克晟(48)
明太祖诛夷功臣原因新探	
——朱元璋与刘邦的比较.....	赵毅、罗冬阳(55)
明代提学教权与社会之变迁	(台湾)吴智和(66)
明南京国子监的校园规划	(台湾)徐泓(77)
明代后妃与政治	杜婉言(95)
论朱元璋的政治蓝图及其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余兴安(101)
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刘迎胜(109)
明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家——庞尚鹏.....	余三乐(115)
浅析明代北京的粮谷再分配机制	
——关于在京文武官俸禄及在京军士月粮.....	(日)田口宏二郎(121)
明代预备仓之研究.....	(台湾)吕士朋(131)
明代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及其意义	陈梧桐(141)
平台召对与崇祯用人	杨海英(145)
从李自成结局研究看清代档案的史料价值.....	王戎笙(151)
李自成之死考辨.....	张德信(155)
民族艺人苏昆生考述.....	何龄修(172)
明末清初江南市镇的构造及其特性	
——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例.....	(韩)金钟博(178)
十六至十七世纪澳门在海上之路的地位与作用.....	邓开颂(182)
关于《朝鲜国来书簿》.....	(日)神田信夫(191)
清朝开国神话再考.....	(日)松村润(195)
对于目前国际满族研究的统计分析.....	(意)斯大理(205)
浅论清代的满语和满族的民族意识问题.....	(美)欧立德(211)

简述族谱中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	冯尔康(226)
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	郭松义(234)
清代绿营兵额的变迁	(台湾)赖福顺(242)
从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关帝崇拜的普及	(台湾)庄吉发(252)
清代经济的兴衰与对外关系	郭蕴静(265)
谈乾嘉时期的思想界	陈祖武(270)
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	黄爱平(279)
清代纂修国史之经过	(美)白彬菊(285)
巴黎满文书目序言	(俄)庞晓梅(293)
四库提要的续修与订补	(台湾)蔡世明(295)
论清代的满文翻译机构	屈六生(307)
清代历史档案与日本的“东洋史”学者	(日)中见立夫(314)
盛京内务府的设置沿革及其历史作用	佟永功、关嘉禄(326)
清入关前皇族之尊称、爵名及相关诸问题考述	杜家骥(332)
清代县的废止与地域社会	
——乾隆年间河阴县的事例	(韩)金弘吉(338)
关于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邸永君(346)
清代乾隆朝五百名知县的统计分析	江 桥(351)
传主行为与书史传记	
——以清代大小于成龙为例	柏 桦(358)
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	叶显恩、(美)居蜜(365)
社会·法律·贞节观	定宜庄(371)
珠江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所见的几种“族谱”资料及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忠烈(379)
十八世纪中国亲属法的基本概念	郑 秦(387)
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刘小萌(395)
论“帐房”	范金民(408)
乾隆时内务府典当业概述	叶志如(414)
清中期北京地区的煤炭生产和流通的变化	(韩)元廷植(422)
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	
——《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	刘志伟、陈春声(433)
从首博馆藏“旗契”看清代京郊旗地转让的几种形式	刘谨桂(439)
清代政府财政与陋规	(香港)张瑞威(450)
近百年来的台湾茶业	(台湾)陈慈玉(453)
略论民国元年汉治萍公司中日合办问题的成因	(台湾)林文仁(461)
英国藏鸦片战争后有关香港和广州的汉文历史文件举隅	(英)科大卫(467)
一八九八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产生的影响	(美)孔飞力(472)
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	赵云鹏(486)
“明信牌档”所载充军罪名疏解	高寿仙(494)

唐努乌梁海与一九一一年外蒙古独立运动.....	(台湾)蓝美华(500)
试论一九二〇年代台湾非武装抗日运动之背景 ——兼论朝鲜三一运动的影响.....	(台湾)林能士(511)
档案与澳门历史文化研究.....	章文钦(517)
燕京旧闻录五则.....	徐莘芳(523)
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李鸿彬(526)
顺治帝的少年时代.....	杨珍(533)
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使始末.....	邓锐龄(541)
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	陈庆英(549)
康熙南巡扬州述略.....	(加)陈捷先(556)
试谈康熙的“实学”思想.....	孟昭信(563)
从《朱笔引见单》看雍正帝识人.....	李克毅(569)
乾隆皇帝信不信喇嘛教.....	王湘云(573)
关于锡热图固实却济的新论.....	乌力吉(580)
西藏地方摄政官职刍议.....	喜饶尼玛(588)
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周润年(593)
高句丽身份制考.....	(韩)金在善(601)
姚遂与元代的古文.....	(美)刘元珠(604)
古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与廉政.....	侯建良(608)
档房论史著新篇	
——访著名历史、档案学家韦庆远教授	郭树银(612)
宏阔的视野，细致的描绘	
——《隆庆皇帝大传》评介	赵中男、高寿仙(616)
韦庆远教授在档案系的岁月里	吴宝康、黄武(619)
人生有为 学术无涯	
——恭贺史学家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	高 放(622)
学力根深方蒂固	
——从《明清史新析》谈韦庆远先生的学术道路	梁希哲(626)
后 记	柏 桦(632)

明清进士与东南文人

(美国) 何炳棣

由于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近千年的中国,平民登进的主要途径是科举制度,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如与其他传统社会比较,更为功利而单纯。俗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明证。这种价值观念既弥漫于整个社会,又深入社会的每个阶层。因此,所谓的人才,最主要的是指考试制度中最高层的成功者——进士。凡是经过会试殿试录取的进士立即镂铭于石——试看北京旧城东北部国子监庭院里的进士题名碑林。一成进士即当然被选入全国的“名人录”,并已取得最优先的入仕资格。传统中国社会既为士大夫所支配,进士题名碑录不仅是研究“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也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power)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

与其他传统资料比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另具有其他两个优点。

1. 明清著名的传记大系,如晚明焦竑所辑的《国朝献徵录》、清光绪初李桓所辑的《国朝耆献类徵初集》、钱仪吉所辑的《国朝碑传集》和闵尔昌所辑的《碑传集补》,选择的标准多少都不免有些主观,远不如进士题名碑录客观。试举一最显著的例子:李桓的《耆献类徵》。由于李是湖南人,《类徵》中选的湖南人士总数之高超过浙江,仅亚于江苏居第二位。30余年前我曾将李桓所得湖南人物总数在各省中的名次与《清史列传》及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刊于《心理》第四卷第一期,1926年3月)比较之后,发现极大的不相侔称。湖南人物总数在《清史列传》中居各省中的第六位,太平天国战争产生了不少湖南“人物”,而在进士的地理分布中竟低到18省中的第15位!

此外,明清传记大系各省人物的编辑往往受地区传记资料多少的影响。例如明代苏州与紧邻松江都是人文荟萃的地区,但松江士人往往称道苏州传统风气的淳美,乐于表扬桑梓间并不成功的人们,虽科举方面失败,凡技艺及行谊有一善可述者,就会有人为他们立传,因此苏州所谓的人物远较松江为盛。晚明过廷训所辑《国朝京省分郡人物考》就是反映类似统计错觉的实例之一。

2. 即使明清私人所辑传记大系取舍标准公正,入选的总人数无论如何较明清进士总数要少得多,自统计学的观点看是“任意”(random)的。只有进士题名碑录才代表“人文”的横切面,在统计的意义上远胜于私人所辑的传记大系。

本文提供六个统计表格,统计数字本身即说明重要史实。这些表格都取自30年前旧作中第六章的一部分。这部旧作《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名《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1967版略加补正;1973意大利文译本问世;1993年日译本《科举与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的阶梯》由东京平八社出版。

本文第1与第2表完全根据明清两代的进士题名碑录,已相当充分说明东南诸省科第人

文之盛。第3至第6表主要是根据地方志，并参考进士题名碑录制成，更进一步反映出东南人才特别集中的一些府、州、县。统计数字本身虽已说明重要史实，但有些史实与一般学人平素的印象并不完全相符。这些与一般历史“常识”不符之处，似有扼要加以文字说明的必要。

20世纪学人熟知现代江苏（包括1949以后的上海市）在全国经济方面无可比拟的领导地位，以为在明清两代人文方面也因经济因素而取得最优越的地位。其实，明代前期，江苏江北人文远逊于清代。就明代进士总数论，江苏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位。即使在清代，江苏进士总数虽居全国首位，但仅仅略超浙江。就明清两代而言，浙江产生6088进士，江苏产生5641进士。何以各省中面积最小，三分之二土地都是丘陵的浙江，居然在漫长的5个半世纪之中，进士总数竟居全国最前列，主要的解释应是南宋建都临安以来积累的种种利于人文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山多田少，长期人口压力与浙东人士之富于进取冒险的精神因素，似亦不应忽略。（这种精神因素，在20世纪前半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表现尤其特殊）。

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江苏的优势是远非浙江所能及。江苏的经济优势自晚明起即较充分地反映于科举，尤其是苏、常两府。江苏经济在清代的“绝对”优势似与清代科举方面的特殊“荣誉”不无关系。如本文第5表所示，有清一代，自顺治3年（1646）开科，至光绪30年甲辰（1904）科举罢废，正恩凡112科，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共336人，而江苏一省即占113人之多！不特此也，除海州一州外，江苏每府、每直隶州都曾产生一甲进士，而苏州一府即占42人。这不仅令当时举国艳羡，而且给与当代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外学人一种错觉——明清时代苏州一府在科举的种种方面都是一向称霸全国的。如第3第4表所示，如以府为单位，苏州在明代进士总数970，居全国第3位，次于江西的吉安府（1020）和浙江的绍兴府（977）。苏州在清代进士总数785，较杭州府少219名，居全国第2。

如第6表所示，如以县为单位，苏州府城（长洲、元和、吴县），相当于1949前的吴县，也不是产生进士最多的县分，在全国名列第4。次于仁和、钱塘（相当于1949前的杭县），一双不可分割的“京县”宛平、大兴，和福建省会闽县、侯官（相当于1949前的闽侯）。

此外，另有两个历史现象需要扼要讨论。福建明代科举甚为成功，而且进士总数，福州、泉州、兴化三府皆在400名以上。漳州府虽远不及以上三府，但与他省一般的府相比还是很成功的。这种科第集中沿海而又相当“均匀”地分配于沿海诸府，想像中应与正德以后与欧洲葡萄牙等国的长期走私性通商有关。新大陆白银由葡萄牙，稍后由吕宋（西班牙）直接或通过菲律宾等地入闽入华的数量及其对明中叶后经济的冲击力，是不容忽视的。泉州、漳州、兴化三府清代科第大衰，亦必与康熙初叶的海禁有关。所以清代科名以福州一府为独盛，而福州中科名又集中于省城闽县、侯官。

本文诸表中最不易解释的现象是明初百年之中，科第以江西省为最盛，江西省中尤以吉安一府为最。此期间吉安一府两度包办三名一甲进士，更是空前绝后的纪录。正因为吉安在明初百年取得非常卓越的成功，所以终明之世仍不因绍兴、苏州两府的急起直追而失去其全国的领导地位。目前只能粗略揣测这现象或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北宋第一个“南”人拜相的王钦若（卒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就是江西人。唐宋八大散文家，宋代居其六。如果四川苏氏一家父子三人算作一“家”，如此，则北宋文学四大家中江西即居其三：欧阳

修(庐陵,即明代吉安府城),曾巩(建昌军,南丰),王安石(抚州,临州)。可惜两宋进士名单仍有待辑补,进士籍贯尚无全盘的统计。但从《明儒学案》可以看出明初百年的经学和哲学重心是江西。王阳明(1472~1528)未逾弱冠,即奉父命去江西求师迎婚,即是例证之一。要较圆满地解释明初百年江西人文之特盛,恐怕还有赖于今后各位学人深度发掘自永嘉(301~312)至宋末江西的历史人文地理。

最后必须指出本文提供的统计数字,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一般方志倾向夸张,往往将业经几代入籍其他省府的进士重复地列入本地。不过大致上不难知道主要的人才输出区和输入区。例如绍兴府无疑义地是一个主要的人才输出区,清代宛平、大兴的进士不知有多少是绍兴师爷之后。宁波及浙东若干府县亦多进取冒险落籍他省,其后裔中式后列入其他省籍。浙江是人才输出省是可以肯定的。清代安徽进士总数低居全国第12位。一方面是由于旧举人额数较少(相反地,浙江自明初即为大省,举人额数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最具动力的徽州商人,不但把财富有效地转化为科名,而且在相当程度之内对江苏科举的成功做出积极的贡献。一般讲来,江苏和直隶(河北)在明清两代都是人才输入区。

表1 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

省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总数	位次
	1371~ 1439	1440~ 1472	1473~ 1505	1506~ 1538	1539~ 1571	1572~ 1604	1605~ 1644		
(北)直隶	72	251	339	335	348	251	302	1898	5
山东	53	124	219	270	325	310	422	1723	6
河南	105	167	201	260	229	295	341	1598	7
山西	49	88	154	190	207	180	241	1109	9
陕甘	39	83	153	184	139	146	237	981	11
江苏	150	328	442	398	395	389	619	2721	2
浙江	290	363	488	532	561	471	575	3280	1
安徽	76	109	157	167	169	170	188	1036	10
江西	345	361	354	357	367	266	350	2400	3
福建	237	211	232	354	309	352	421	2116	4
湖北	40	59	113	154	165	191	246	968	12
湖南	27	66	89	72	47	57	68	426	14
广东	62	195	227	241	231	206	261	1377	8
四川	57	87	125	137	128	88	169	791	13
广西	10	16	30	35	36	19	27	173	16
云南	4	13	27	45	35	39	78	241	15
贵州	0	7	4	10	17	20	27	85	17
辽宁	0	10	13	13	10	4	7	57	18
总计	1616	2522	3367	3754	3718	3444	4559	22980	

资料来源: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乾隆 1746 括大版,附全部明代进士题名碑录,而康熙 1720 初版碑录仅限清开国以来诸科。

表2 清代分省进士统计表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总数	位次
	1644~	1662~	1723~	1736~	1796~	1821~	1851~	1862~	1975~		
	1661	1722	1735	1795	1820	1850	1861	1874	1904		
直隶	432	498	161	488	275	313	92	135	307	2701	3
山东	419	429	105	259	210	268	79	118	273	2260	4
河南	297	311	81	282	133	169	95	108	217	1693	6
山西	250	268	81	311	141	143	47	58	131	1430	7
陕甘	169	190	60	228	121	138	94	95	280	1385	9
江苏	436	666	167	644	233	263	69	124	318	2920	1
浙江	301	567	183	697	263	300	87	108	302	2808	2
安徽	128	142	43	216	164	166	39	76	215	1189	12
江西	83	200	115	540	223	265	74	122	273	1895	5
福建	118	178	99	301	156	150	46	82	269	1399	8
湖北	189	191	69	212	126	135	43	72	184	1221	11
湖南	30	44	39	128	102	106	31	68	178	726	15
广东	34	91	69	252	106	139	36	79	206	1012	13
四川	15	61	31	159	88	108	49	71	181	763	14
广西	2	28	17	102	67	91	27	72	164	570	18
云南	0	46	48	129	117	119	36	42	156	693	16
贵州	1	31	29	129	98	95	29	44	143	599	17
辽东	4	25	10	29	20	26	12	17	40	183	19
八旗	56	122	92	179	178	275	61	97	240	1300	10
总计	2964	4088	1499	5385	2821	3269	1046	1588	4087	26747	

资料来源：房兆楹、杜联哲《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北平哈佛燕京引得，1941。

表3 明代科举领先诸府

府名	进士总数
吉安(江西)	1020
绍兴(浙江)	977
苏州(江苏)	970
南昌(江西)	713
常州(江苏)	661
福州(福建)	654
泉州(福建)	627
宁波(浙江)	598
嘉兴(浙江)	528
兴化(福建)	524
杭州(浙江)	520
松江(江苏)	466
广州(广东)	437

资料来源:《吉安府志》光绪 1876;《绍兴府志》乾隆 1792;《苏州府志》同治 1862;《南昌府志》同治 1873;《常州府志》光绪 1877
 重刊乾隆 1794 府志;《福州府志》乾隆 1754;《泉州府志》乾隆 1763;《宁波府志》乾隆 1730;《嘉兴府志》光绪 1878;
 兴化府明代进士数目取自《福建通志》民国 1922;《杭州府志》民国 1923;《松江府志》嘉庆 1819;《广州府志》光绪
 1879。

表4 清代科举领先诸府

府名	进士总数
杭州	1004
苏州	785
福州	723
常州	618
广州	597
绍兴	505
嘉兴	476
湖州	421
南昌	413

资料来源:《杭州府志》民国 1923;其余诸府志均详表 3 资料来源,但皆以房兆楹、杜联哲之《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补充;唯湖州府进士数字取自《国朝湖州府科第表》1905 科举罢废后刊印本。

表 5 清代江苏府州一甲进士统计

府、州名	总数
苏州	42
常州	20
松江	7
镇江	12
扬州	11
江宁	7
徐州	1
太仓州	9
(南)通州	4
海州	0

资料来源：房兆楹、杜联哲《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

表 6 清代科举领先县分

县名	进士总数
仁和, 钱塘(相当 1949 前杭县)	756
宛平, 大兴	691
闽县, 侯官(相当 1949 前闽县)	557
长洲, 元和, 吴县(相当 1949 前吴县)	504
乌程, 归安(相当今之吴兴市)	325
山阴, 会稽(远小于今之绍兴市)	277
武进, 阳湖(相当今之常州市)	265
番禺, 南海	248
上元, 江宁(南京市的一部分)	184
江都, 仪徵	175
嘉兴, 秀水	168
无锡, 金匱(相当今之无锡市)	163

资料来源：相关诸府、县志，例皆以房兆楹、杜联哲《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加以补充。长洲, 元和, 吴县根据《国朝苏州府长, 元, 吴三邑科第谱》, 1906。乌程, 归安根据《国朝湖州府科第表》, 1905。光绪 1883《无锡、金匱县志》进士总数，经与房、杜《碑录》比较，失之过高，故不取。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邹逸麟

我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存在一条农牧业过渡带。这是一条由于天然水分条件的限制,由旱作不稳产区过渡到气候干旱致使无灌溉不适宜发展作物种植的地带,是农业生产上一条很重要的界限。在我国北部反映在西起河套、东至大兴安岭南端的地带(此线以东以西农牧界限在历史上没有显著变化)。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我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的结论,以至有些历史现象未能解释清楚。本文企图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否正确,尚无把握,不过作为一种看法提出来,希望引起有关同行的讨论。

一、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农牧过渡带

据今人研究,十三世纪的气候是一个比现在更温暖的气候期。这个温暖期大约结束于该世纪末。在十四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东部气候已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①。这种转变在我国北部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诺尔西北内电河北岸)及更北的口温脑儿的黄土山(今查干诺儿南)和应昌府(今克什克腾旗西)都有屯田。至元二十、二十二年(1283、1285)政府曾出钞四万五千锭在上都、应昌府和籴粮食^②。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温脑儿黄土山一带民田^③。可见这一带农业还是相当可以的。然而到了十四世纪初(至大元年,1308),应昌府的屯田撤销了。蒙古高原上的气候有明显转寒的现象。延祐年间(1314—1320)“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④。1323、1328(天历元年、致和元年)蒙古高原上曾发生过二次严重寒潮,“风雪毙畜牧”^⑤,造成严重后果;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陨霜杀禾”的记载^⑥。此外,进入十四世纪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五至八月间陨霜、雨雹、风雪记载特多(详见本所编制《中国历史气候灾害年表》),可以认为进入十四世纪以后北中国气候转寒的事实是有充分材料根据的。

① 满志敏等《中国东部十三世纪温暖期自然带的推移》,刊《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研究进展》(一)海洋出版社1990。

② 《元史·世祖纪九、十》。

③ 《元史·世祖纪十二》。

④ 《元史·拜住传》。

⑤ 《元史·泰定纪一、二》。

⑥ 《元史·宁宗纪》。